

二十一世紀評論

互聯網與中國變遷

互聯網與民主：西方中國 網絡研究的政治化

周永明

依照西方人的想像，中國政府在面對互聯網的威脅時一定會竭力對這一「巨獸」加以控制，但注定徒勞無功。稍後西方人不無驚訝地發現，中國政府似乎並沒有被「巨獸」衝擊得潰不成軍，對網絡的掌控看起來彷彿游刃有餘。

短短二十年間，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現代網絡技術對人類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方式各方面衝擊影響程度的深刻廣泛，可謂無遠弗屆。因此，各學科的學者從各個角度對網絡展開了可以說是同步跟蹤式的研究，範圍之廣、力度之強也是前所未見。根據筆者在美國二十年的觀察，就西方世界對議題的關注度而言，網絡技術可以比肩艾滋病和氣候變化，研究範圍涵蓋了人文、社會科學及科學技術的方方面面，成為當前跨學科的「顯學」。

和身處網絡技術前沿的歐美相比，互聯網要到1990年代中後期才開始進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但幾年的滯後期並沒有妨礙西方對中國互聯網發展的濃厚興趣。幾乎從第一時間起，媒體、學者和政客都爭先恐後地對中國互聯網的發展發表看法。筆者從那時開始就留心西方^①的報導和研究，得到兩個印象：一是西方對中國互聯網的關注程度比之歷史上其他傳播通訊技術（電報、電話、廣播、電視、衛星通訊）都更為強烈，從媒體報導的頻率和學術研究的熱度可見一斑；二是西方的研究有很強的政治化網絡技術的傾向，常常預設這一特殊技術具有直接影響政治制度和統治方法的功能，將互聯網和民主視為自然的互助共生體。從這一角度出發，西方將網絡技術和中國的政治變革，尤其是自由化和民主化，從一開始就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筆者曾經以「巨獸」情結來形容西方對互聯網進入中國的初期反應。一開始，西方將互聯網視為一個具有強大信息傳播能力的「巨獸」，它不受任何等級結構的約束，能夠實現信息傳播的民主化和最大化，是打破媒體控制的有效武器。依照

* 筆者在此對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孟冰純博士撥冗閱讀本文初稿並提出建設性意見表示感謝

西方人的想像，中國政府在面對互聯網的威脅時一定會竭力對這一「巨獸」加以控制，但注定徒勞無功，因為這頭「巨獸」是不可控制的、無堅不摧的。不過，稍後西方人不無驚訝地發現，中國政府似乎並沒有被「巨獸」衝擊得潰不成軍，對網絡的掌控看起來彷彿游刃有餘。於是，中國政府又被描繪成一個控制網絡的「巨獸」，想方設法限制互聯網在中國的發展^②。然而，出乎眾人意料的是，短短十年左右，到2008年底，中國網民的人數已近三億人，位居世界第一^③；互聯網的發展也的確對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產生了巨大的、深遠的、複雜的影響，但影響的範圍、方式和力度絕非眾多西方研究中政治化的技術決定論所預言的那樣簡單^④。

這一戲劇性發展讓西方早期的種種烏托邦式的預測顯得貽笑大方。近年來，西方對中國網絡的研究已經超越了這種粗糙的技術決定論，但總的來說，對網絡與中國政治的討論依然是學界和媒體的重點。本文試圖解構剖析這一西方現象，進而對網絡研究的視角走向提出一些觀點。

一 凝視與命題權：中國網絡研究焦點的解析

互聯網在中國的一舉一動似乎都受到西方的關注。無論是中國政府頒發有關網絡的條例法規，還是網站的關閉和網絡異議人士的命運，抑或是國外電訊傳媒公司在網絡監控上對中國政府的妥協，都會受到媒體的報導和互聯網觀察者的跟蹤和記錄。筆者認為，這種異乎尋常的關注並不是人們對網絡作為一種影響巨大的新媒體的必然反應，而是折射出西方和中國之間一種特殊的權力關係。在這個關係中，中國處於一種被觀察、被凝視的位置。關於觀察位置與權力的關係，福柯 (Michel Foucault) 在《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一書中做過精闢的論述。他指出，通過圓形監獄這種特殊設計，代表國家權力的獄警可以對作為個人的囚犯進行單向的、全方位的觀察和凝視，從而達到控制的目的^⑤。西方對中國網絡的關注，正是強勢權力位置的反映。那麼下一個合乎邏輯的問題就是，這種關注的背後又是出於何種動力？

有趣的是，和福柯強調凝視的控制效果不同，西方對中國網絡的關注矛頭直指被視為網絡控制「巨獸」的中國政治制度和政府。由於網絡被視為推進民主的利器，因而中國政府對網絡的控制便被視為必須打破的障礙。這種話語佔據了西方媒體和學界的主流^⑥。然而，歷史卻冷靜地反覆宣告這些樂觀想像的盲目性。和以往各種技術相比，網絡似乎更具「民主」特性，這體現在這一技術本身的互動性、非等級性、大眾接觸的便利性和驚人的覆蓋面。這些特徵讓互聯網具有巨大的政治吸引力^⑦。不難理解，當一些西方學者將目光轉向中國時，互聯網作為一種與民主制度共生的技術，在威權的政治體制中如何破解和抵制政府對網絡的壓制和操控，自然成為他們關注的中心。

所以說，西方對中國網絡的關注不僅在於它將自己置於凝視者的位置，同時其凝視焦點也充當西方觀念折射者的角色。在中國網絡這個特殊的案例上，筆者

無論是中國政府頒發有關網絡的條例法規，還是網站的關閉和網絡異議人士的命運，都會受到西方的關注，這種異乎尋常的關注並不是人們對網絡作為一種影響巨大的新媒體的必然反應，而是折射出西方和中國之間一種特殊的權力關係。

認為西方將其對網絡功能的信任和對理想政治的期待揉合在一起，有重蹈以西方為中心建構他者幻象的危險。薩依德 (Edward W. Said) 在分析西方對東方的認識時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由西方探險家、遊客、學術研究機構以及文人學者的著述和記載組成的所謂「東方學」(Orientalism)，就其本質而言，不過是位於權力中心的西方對東方的一種想像建構，充滿偏見扭曲；然而，這種建構成為歐洲根深蒂固的東方主義的基礎，更成為日後殖民主義的理論依據和行動指南^⑥。雖然當前擺在我們面前的民主自由觀念依然閃爍，但從本質而言，以民主自由為依歸的很多話語和東方主義式的審視有共通之處。當然人們不得不承認，當前有關民主的話語依然享有霸權的位置，很難看到這個框架在短時間內有失去合法性的前景。

面對西方政治化的中國網絡研究的事實，我們要做到知其然並知其所以然，才能對中國網絡研究整個領域有一個比較自覺的了解，才能掌握研究的命題權，主動提出研究課題和走向，成為議程設置者。

看清了西方的權力位置和觀念折射，其對中國網絡的關注中心就比較容易理解了。必須聲明的是，筆者在此並不是反對從政治角度對網絡進行研究。研究網絡技術和政治的互動關係本身，當然是網絡研究重要的一部分，筆者從事的研究也和網絡政治密切相關。在上文中，筆者只是以西方對中國網絡的關注為例，對網絡政治研究本身所涉及的政治話語體系做一解構。面對西方政治化的中國網絡研究的事實，我們要做到知其然並知其所以然。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對中國網絡研究整個領域有一個比較自覺的了解，才能掌握研究的命題權。事實證明，只有具有命題權，我們才能主動提出研究課題和走向，才能成為傳播學裏所說的議程設置者。

二 網絡民族主義：個案分析

有關中國網絡民族主義的研究是一個很好的說明例子。中國網民在互聯網上表現的民族主義情緒，尤其是對一些重大國際事件的反應，遠至19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後印尼對華人的迫害，近到2008年奧運火炬在歐美傳遞因西藏問題受到的干擾，一直受到西方學者的注意，有關專著論文不時出現。實際上，網上(和網下)的民族主義各處可見，但為甚麼中國網絡上的民族主義成了西方人關注的問題，而對西方世界中(包括其網絡上)的民族主義，他們卻不常提及？掌握命題權此時就顯得格外重要。以美國為例，民族主義現象隨處可見。五歲的兒童一入學前班，首先學的就是「忠誠宣誓」(Pledge of Allegiance)；體育比賽前起立奏國歌；獨立節時全美大小小城市舉行的遊行和燃放煙火；屋前飄揚的、車上貼的、T恤上印的國旗隨處可見；開赴伊拉克、阿富汗的部隊舉行出征儀式時，到處是手握星條旗的送行者。筆者旅美二十年，卻難得聽到美國人用「民族主義」來分析以上現象。

透過表面現象，筆者認為這和美國對民族主義特有的視角密切相關。和中國一樣，在美國的政治語彙中，也有「愛國主義」(patriotism)和「民族主義」(nationalism)兩個概念。前者帶有褒義，常被大眾媒體所用。後者指的是公民對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認同效忠，但在美國語境中帶有貶義，常用來指稱類似納粹式思潮和非理性的強烈排外情緒。在這種特定的劃分下，美國人的民族主

義行動被常態化為愛國主義的表現，所以自然而然地脫離了媒體和學術界的視線。而言及中國，西方學者則對兩者不加區別，將愛國主義一概視為中國政府倡導的民族主義的代稱。中國民族主義被他們視為具有巨大潛在危險的情緒。這個例子充分體現了命題權的重要性。西方對中國網絡民族主義的注意，與其固有的思維框架密切關聯。

與此同時，西方觀察中國民族主義還有其特定的視角。在此僅舉兩例。一是「病理學」的角度，其基本論調是因為中國在近代歷遭西方欺凌，心理受到巨創，所以對外界如何對待自己特別敏感，有時會出現過度反應。簡言之，中國民族主義有病理因素，因此西方人很願意教導中國人應該學會用「健康」的心態來對待西方，可笑的是有些自許為世界主義或全球公民的中國人也同聲附和。換個角度思考，這種論調依然折射出西方位於權力中心位置的優越感。直白地說，就是創傷的加害者 (inflictor) 以診斷者自居，掌握定義何為「健康」反應的話語權。另一是「操縱」的角度，西方常常視中國政府為民族主義的操縱者，在幕後揮舞民族主義的雙刃劍，既要利用民族主義達到鞏固統治合法性的目的，又要留心不讓它失控轉而危害自己。這種貌似深刻的論述有一個暗藏的假定，即當代中國民眾都是愚民，沒有主觀能動能力 (agency)，常常被政府操控而變成民族主義的盲從者。很多西方人往往不能理解，相當一部分中國人一方面保持相當強的民族主義立場，但同時又對中國政府的政策，以至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給予嚴肅的剖析和批判。

要深入了解西方對中國網絡民族主義的關注，還需對民族主義有一般性的了解。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民族主義是當今世界上最複雜的政治現象之一。它不是單性體，而是包含了許多內容。作為一種社會政治運動，如果從法國大革命算起，民族主義已有兩百多年的歷史。歐美國家領風氣之先，基本上已經實現了運動的終極目標，即建立現代民族國家，並且成功地培育了國民對其民族國家的認同。這個過程漫長且需具備各種客觀條件。對於民族國家認同感的塑造，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強調報章和書籍發揮的媒介作用^⑩，格爾納 (Ernest Gellner) 看重現代國家教育制度和工業化，史密斯 (Anthony D. Smith) 則強調氏族集團歷史和集體記憶的重要，而霍布斯邦 (Eric Hobsbawm) 等人披露了種種「被發明的傳統」的功用^⑪。相較而言，民族主義傳入中國才不過短短百年出頭。要完成向民族國家的轉型，中國不可缺少民族主義。試想，當今中國還處在需要借助「村村通」工程 (道路、廣播、電視) 使廣大鄉村和國家中心區域相連，真正意義上的義務教育剛剛在全國實施，民族歷史傳統儀式還有待進一步闡述發揮的階段，和西方國家相比，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時來妄議中國民族主義的過度發展，是典型的時間錯位 (asynchronism)。

民族主義作為一種信念，對外強調國家主權的不可侵犯和各國間相互平等，對內則認為每個公民應享有同等權利和義務。歷史表明，這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念而已。民族主義作為一種大眾動員的手段，常常展現出巨大能量。也許這一點才是讓西方觀察家憂心忡忡的所在，擔心極端、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會給現有世界帶來破壞性的危險。其實，民族主義本來就很難與理性掛上鉤。

當今中國還需要借助「村村通」工程使廣大鄉村和國家中心區域相連，真正意義上的義務教育剛剛在全國實施，民族歷史傳統儀式還有待進一步闡述發揮。這時來妄議中國民族主義的過度發展，是典型的時間錯位。

用安德森的話來說，民族主義建立在對一個「想像的共同體」的認同之上，心理的投射和情感的交錯構成其重要組成部分^①。它既有功利性的目標，又充滿不計較犧牲的激情。正因為此，民族主義用於大眾動員常常十分有效。

西方學者常以網絡上的言論為對象，表達對中國極端民族主義的擔憂，但筆者認為，網絡的出現及中國民眾對信息的了解，恰恰可以減少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走向極端的可能^②。筆者稱此為「知情的民族主義」(informed nationalism)。通過對具有濃厚民族主義色彩的軍事網站的個案研究，筆者發現，這些網絡民族主義者一般受過良好教育，熟悉網絡技術，對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信息掌握充分，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凡此種種，使得他們很難成為政府簡單的操縱品。實際上，他們使用的分析概念和框架，和西方都有淵源關係，這一點是西方學者經常忽略的。最令人驚訝的是，很多網民對西方愈是了解，愈對西方持批判態度。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當代民族主義與西方對待中國的態度密切有關。西方學者如果不改變視角，將很難完全理解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③。

我們該如何考察層出不窮的新現象？研究者不妨注意一下類似技術的歷史。對歷史的了解不僅讓那些倉促得出的結論失去支撐，而且也可以反襯出西方研究中國網絡的出發點往往出自他們的經驗和視角，和中國實際並不相符。

三 晚清電報：歷史的視角

用「迅猛」兩字形容網絡技術在中國的發展一點也不誇張。我們該如何考察層出不窮的新現象？筆者認為研究者不妨注意一下類似技術的歷史。對歷史的了解不僅讓那些倉促得出的結論失去支撐，而且也可以反襯出西方研究中國網絡的出發點往往出自他們的經驗和視角，和中國實際並不相符。筆者的這個立場也是有感而發。在拙著《歷史視野中的網絡政治》(*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 Telegraphy,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一書序言中，筆者提到自己進行晚清電報個案研究的緣起。2001至2002年，筆者在華盛頓的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做了一年研究員。該中心是美國一個中間偏左的智庫，在那裏，筆者不光可以接觸到學者，還能接觸政客和新聞界人士。每當他們得知筆者從事和中國互聯網有關的研究時，幾乎都會問同一個問題：「你覺得互聯網能改變中國嗎？」或「互聯網能幫助中國實現民主嗎？」

筆者發現自己很難給他們一個簡單的回答。這種基於技術決定論的問題本來不值回答，但在當時卻深受媒體甚至學者的認可，成為一個流行的話題。筆者當時的標準回答是：互聯網肯定會讓中國發生變化，但不一定能使中國像你們希望的那樣變化，因為它可以被不同人以不同方式使用以達到不同的目的。舉個例子，電報是現代意義上最早的信息技術，而1905年中國人第一次大規模地使用電報進行政治動員不是為了民主，而是為了抗議美國的排華法案而發起的抵制美貨運動。換言之，中國人當今也可以運用互聯網進行反對美國的民族主義動員。筆者的回答觸及了網絡與民主和民族主義兩個最受關注的議題，但這樣的回答讓當時許多提問者的失望之意寫在臉上。

電報的歷史可以讓人們認識到在具體的社會語境中考察技術的重要性。這一出現於十九世紀中葉的信息技術在美國和中國的歷史軌迹迥然相異。美國傳播學家凱瑞 (James W. Carey) 就電報對美國的影響進行了詳細的考察，認為電報直接導致了通訊社的出現和新聞文體的變化，促成了股票期貨市場的改進，改善了鐵路與遠洋海軍編隊的調度，影響了美國人的時空觀甚至宗教意識。凱瑞還指出，對於這些新現象，應放在當時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發展這個更寬的框架內加以觀察^⑭。離開了大的歷史背景對單個技術進行考察，往往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而在清末中國，凱瑞所舉的電報影響基本上不存在。事實上，從1861年沙俄要求在中國架設電報線到1881年底清政府開通津滬線，光圍繞建還是不建電報線的決策就花了二十年。清政府的拖延，不可簡單歸結為官員的頑固守舊或是民間對電報線破壞風水的恐懼。細讀史料，筆者發現當時決策者的主要考慮圍繞兩字：「利」和「權」，即架設電報線對誰有利？又控制權屬誰？清廷主要擔心的是，若允許外國在中國獨立經營電報，以列強在軍事和技術上的優勢，電報只會讓清廷失利喪權。這種思路決定了清廷堅持不允許外國在中國陸地架設經營線路。今天中國政府在應對互聯網技術面臨的內外環境，和晚清不可同日而語。

和互聯網相似的是，電報對擴大晚清的政治參與有所幫助。一個獨特的現象就是社會精英階層（能夠接觸這一技術的群體）通過拍發「通電」（公電）來公開表達政治觀點和進行社會動員。通電通常指的是用明碼拍發給多個收發者的電報，最終被報刊轉登而擁有眾多讀者。通電是中國特有的政治文體 (political genre)，是當時最先進的技術和古代中國檄文的結合。特別值得強調的是，和當今網絡上流傳數不勝數的「帖子」相比，通電是一種更具權威性的文體。這有多重原因：首先，高昂的拍發費用決定了很少有人會用通電來討論瑣事；其次是因為其內容要受到公眾的審視；再次，通電常常是由多人聯名簽發，增加了它的公信度。最重要的是，通電必須經由報章轉登才能到達眾多讀者，通電內容還要通過報刊編輯的評判。筆者將這幾點稱做「提升權威性」的過程。通電據此成為對重大事件發表嚴肅看法的一種權威性手段^⑮。

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晚清面臨接踵不斷的危機之際正是通電運用最頻繁的時候。筆者發現《申報》中的第一份通電出現於《馬關條約》簽訂後的1895年，當時不願歸附日本的台灣民眾成立「台灣共和國」，並發電清廷大員求援^⑯。戊戌變法失敗後，散布世界各地的保皇會成員時常發通電向慈禧太后施壓。在以後的己亥建儲、抵制美貨、鐵路路權風潮等重大事件中，通電被愈來愈廣泛地加以運用；真正的高潮出現在立憲請願運動時期，通電似乎成為運動進行宣傳和組織動員的最重要手段^⑰。對於當前相信網絡技術具有促進民主特性的人來說，通電被用來促進君主立憲的事實最具有可比性。然而，廣泛採用通電並沒有使立憲派成功阻止民族主義革命者在武昌起義後迅速成為政治主角。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無論是軍閥、國民黨還是共產黨，不同的政治理念並不妨礙他們繼續運用通電來為各自的政治目的服務。事實表明，技術可能性的發揮受制於具體的社會歷史環境，歷史視角有助於研究者更好地了解整個圖景。

對於當前相信網絡技術具有促進民主特性的人來說，通電被用來促進君主立憲的事實最具有可比性。然而，廣泛採用通電並沒有使立憲派成功阻止民族主義革命者在武昌起義後迅速成為政治主角。

四 政府「操控」神話和信息接收語境

西方研究者對中國互聯網的關注除了上述的「民主」、「民族主義」命題外，還有一個常見的「控制」主題，即視中國政府為控制網絡、壓制信息自由流通的「巨獸」。但面對互聯網在中國的飛速發展，西方觀察家又往往難以自圓其說。筆者一直認為，互聯網是中國政府整個媒體政策的一部分，總的趨向是在允許商業化的同時保持政治控制。網絡和廣播電視相比，政府政策並沒有根本區別。而且中國政府對媒體的掌控技巧愈來愈精緻化，從極權時期嚴密的控制演變到現在相對彈性的管治。當然，離西方式的對媒體進行常態化的管理還相距甚遠。限於篇幅，筆者不打算就此話題展開論述。在此想強調的是，中國市場的巨大商機使得通常被視作威權體制挑戰者的私有資本乃至跨國公司，扮演一種矛盾的角色。在中國政府外包 (subcontract) 部分控制責任給商業利益追求者時，潛在的挑戰者往往變成悄悄的合作者^⑩。

在2005年底和2006年初，美國媒體廣泛報導了跨國媒體巨頭雅虎 (Yahoo)、谷歌 (Google)、思科 (Cisco Systems) 以及微軟 (Microsoft) 旗下的MSN如何屈服於中國政府的壓力，或提供網絡異議份子的上網記錄，或關閉敏感博客，或屏蔽某些搜索結果，甚至提供技術硬件，幫助中國封殺網絡自由。一時間網絡衛士嘩然，群情激憤。美國國會專門為此召開聽證會，更宣稱要制訂針對性的「中國互聯網信息自由法案」，但後來不了了之^⑪。2006年3月，筆者應邀在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和國會早餐簡報會就中國互聯網問題做了兩次發言，核心觀點就是：美國不應該將關注的中心只放在信息的自由流通上，擔心中國網民接收不到外部信息；事實上，隨着技術的進步和對網絡熟悉程度的提高，愈來愈多的中國網民有能力接觸大量信息。相反，美國應該關注的是信息的接收解讀，尤其應該慎思一下為甚麼許多充分知情 (well informed) 的中國網民，對西方津津樂道的「自由」、「民主」觀念持懷疑甚至排斥態度^⑫。很顯然，把這些網民都視為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宣傳機器中的螺絲釘和潤滑油，是非常膚淺的看法。

信息的傳播和解釋是一個雙向流程。信息接收者不是一個被動者，他對接收的信息可以進行選擇和再解釋^⑬。筆者作上述發言的目的是要讓美國網絡捍衛者換個視角看問題，反省一下造成中國民眾對西方主流觀念持如此「接收語境」(receiving context) 的自身因素。除了上文提到的中國軍事論壇網民，海外華人留學生也是個很好的例子。由於身處海外，這個特殊華人群體可以享受歐美媒體的「自由」信息，可謂充分知情。但據筆者觀察，許多海外華人對西方媒體持懷疑和批評態度。歐美媒體對中國號稱「客觀」的眾多報導，不僅讓其原有的公正自由光環褪去^⑭，還引起華人對西方推介自由、民主、人權這些美好觀念背後真正的意圖產生質疑。2008年奧運火炬傳遞期間西方媒體就西藏問題的報導，引起許多海外華人的憤怒，把這一現象簡單地歸結為中國民族主義高漲顯然是不夠的，把海外華人和留學生的憤怒視為中國大使館的操縱更是荒謬不堪。在這樣的接收語境裏，西方信息在中國網絡的「自由」流通只會收到適得其反的效

愈來愈多的中國網民有能力接觸大量信息，美國應該關注的是信息的接收解讀，尤其應該慎思一下為甚麼許多充分知情的中國網民，對西方津津樂道的「自由」、「民主」觀念持懷疑甚至排斥態度。

果。為此，筆者多次向搞政治學的同行建議，在中國學生和海外華人留學生群體裏開展對比性問卷調查，通過實證性量化研究，檢討他們在信息控制環境（國內）和信息自由環境（國外）中對西方觀念接受程度的差異，以驗證筆者上述的觀察和感受。

五 結束語

本文無意提供一份歐美有關中國網絡研究的詳盡文獻評述。筆者只是結合近年來所做的研究，就西方對中國網絡過度政治化的關注做一反思，對其立場和視角進行解構。西方現有研究中國互聯網的常見命題和視角，是一種強勢權力地位的投射乃至幻象。就這些命題而言，本應從多重角度來審視。歷史視角可以提供比較借鑒，視為當然的結論可以從反向視角加以檢討。研究網絡信息的發送和接收語境同樣重要。

可以想見，西方關注的政治化命題，會在相當長的時間裏繼續吸引西方和中國學者的注意。但在討論民主、民族主義和媒體自由時，西方如果只從單方面出發，不考慮自身因素對中國接收語境的影響，就不可能對中國網絡及其影響有一個全面的了解^②。與此同時，中國學者研究網絡時，應有足夠的自覺，擺脫先入為主的政治化傾向，不必對西方亦步亦趨。運用西方常用的分析概念研究中國網絡現象時應檢討其適用性^③。在了解西方命題目的和角度後，中國研究者應注重尋找符合中國網絡大語境的命題和視角。不僅要探討「互聯網如何影響了中國」，而且要關注「中國怎樣影響了互聯網」^④。唯有如此，才能彰顯網絡發展的中國特色，形成一個命題和視角豐富多彩，具有獨立話語權的跨學科研究領域。

中國網絡的政治化命題會繼續吸引西方和中國學者的注意。在討論民主、民族主義和媒體自由時，西方如果只從單方面出發，不考慮自身因素對中國接收語境的影響，就不可能對中國網絡及其影響有一個全面的了解。

註釋

① 「西方」一詞在本文中是泛指。在討論中，筆者不可能涵蓋所有西方對中國互聯網的研究，而主要以自己比較熟悉的美國為例。

②③④ Zhou Yongming, *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 Telegraphy,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3; 104-30; 59-130.

③ 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2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09年1月），www.cnnic.net.cn/index/0E/00/11/index.htm。

④ 參見《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本期的有關文章。

⑤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7).

⑥ 必須指出的是，期望新傳媒技術成為民主的助推劑這種思路早已有之。廣播、電視、衛視的出現，每次都激發了一些人的歡呼，認為從此有了推進民主的技術手段。傳媒大亨默多克（Rupert Murdoch）就曾經認為衛視有助於推翻極權統治，但他後來為了打入中國市場不得不降低調子。

⑦ 西方的各種基金會積極資助有關互聯網和民主的研究。國外的大學裏不光有專門研究互聯網和民主政治的研究所(如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政治民主國際網路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Politics, Democracy & the Internet])，連牛津、哈佛這類持重的老牌名校，也很快成立了互聯網研究機構(如牛津互聯網中心[The 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和哈佛法律學院的博克門社會與網絡中心[The 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 Society])。形成反差的是，兩所學校迄今也沒有成立傳播學系。

⑧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⑨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⑩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and New York: Blackwell, 1987);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⑪ 參見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特別是“Introduction”，1-7。

⑫ 值得注意的是，「極端」是一個充滿價值判斷的前綴。任何思想或行為被冠以「極端」，都會有幾分負面的含義。所以我們對行使這一「前綴權」的合法性應加以審視。舉個例子，2001年中美軍機在南海相撞，美國網上論壇充滿民族主義情緒的言論。對此，美國的網絡觀察者和研究者自然是視而不見，但他們卻津津樂道中國網絡上的「極端」民族主義。由此可以看出，衡量「極端」的標準是相對的，因評判者立場視角不同而相異。

⑬ 參見Zhou Yongming, “Informed Nationalism: Military Websites in Chinese Cyberspace”,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4, no. 44 (2005): 543-62。

⑭ James W. Carey,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1988)，特別是第八章，“Telegraphy and Ideology: The Case of the Telegraph”，201-30。

⑮ 見《申報》，1895年5月25日。

⑯ 詳見周永明：〈管治私有化與網絡信息接收語境〉，《二十一世紀》，2006年6月號，頁28-33；Zhou Yongming, “Privatizing Control: Internet Cafés in China”，in *Privatizing China: Socialism from Afar*, ed. Aiwā Ong and Zhang Li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214-29。

⑰ 美國的政治注意力非常短暫。隨着公眾的注意力又回到伊拉克戰爭等焦點上，「互聯網信息自由法案」的提議也無疾而終。

⑱ 參見Zhou Yongming, “Understanding Chinese Internet Politics”，*Asia Program Special Report*,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no. 131 (June 2006), 21-25, www.wilsoncenter.org/topics/pubs/FinalASIA_131.pdf。

⑲ 傳播學中對此已做過深入探討，經典著作有Stuart Hall,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1973)。

⑳ 也許對信息的不完全了解正是這些光環能夠形成的因素之一。1980年代中國知識份子對西方觀念的廣泛認同是值得研究的個案。

㉑ 當然有關問題，譬如西方應該做些甚麼來改變接收語境，涉及政策層面，已超出單純媒體研究範圍。

㉒ 例如另一個網絡研究者常用的概念是「公民社會」。限於篇幅，本文對此沒有展開討論。

㉓ 此觀點引自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孟冰純博士和筆者的通信，2009年2月25日。